

“水利灌区”的形成及其演变

——以处州通济堰为中心

林昌文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通济堰位于浙江丽水市莲都区碧湖盆地的堰头村,是引松荫溪灌溉的中型水利设施。通济堰灌区的形成与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1)南宋时期,建立了堰坝—干渠—石函—叶穴—斗门—槩的主要设施,奠定了通济堰“灌区”成立的基础,逐步形成“三源四十八派”的系统。(2)元明清,三源的范围不断调整,进一步的开挖添设湖塘堰等设施,通济堰灌区发生较小系列的变化,“灌区”进入缓慢演变的过程。诸多“水利灌区”,可能与通济堰“灌区”相类,走过其成立及扩展、联合或者萎缩的过程。

【关键词】水利灌区;通济堰;浙南

【中图分类号】S-09 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1)03-0093-10

The Formation and Transi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Area”

——Case Study based on T’ung-Ji Weir at Chuzhou

LIN Chang-zh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T’ung-Ji Weir, located at Bihu basin of Zhejiang province, is a middle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y which conducts water from Songyin stream (松荫溪). There are some phase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ung-Ji irrigation area: (1)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established central facilities such as weir—main canals—Ye cave (叶穴)—sluice gates—Gai (槩). This made the foundation of T’ung-Ji irrigation area, generated “three sources (三源) and forty-eight veins” system. (2) in Yuan and Ming-Qing Periods, the range of three sources were being adjusted continuously, more facilities such as lakes, dykes and weirs were being further increased. However, the T’ung-Ji irrigation area itself made a little change, and got into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Lots of other irrigation areas, as T’ung-Ji irrigation area as, might have the processes of formation, expansion and decline.

Key words: irrigation area; T’ung-Ji weir (通济堰); southern Zhejiang province (浙南)

在水利史研究中,论及“水利灌区”,一般都述其最盛时的情况,而对其形成及其演变过程,则甚少揭橥。本文以浙南处州通济堰为个案,梳理自宋以来通济堰“水利灌区”的形成及其联合、扩展的演变过程,阐释“水利灌区”的意义。

[收稿日期] 2011-02-12

[作者简介] 林昌文(1985-),男,厦门大学历史系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地理及乡村社会史。

一、何谓“水利灌区”？

大凡一地农田水利,因倚赖于相应的水利设施而形诸一定范围内的灌溉用水区域,是为“水利灌区”。换言之,某地只有使用共同的水利设施供给的水源灌溉农田,方可称其为同一“水利灌区”,即在地理空间意义上,“水利灌区”是以公共水利设施为基础并以水为纽带而形成的用水区域。无论是水渠灌溉、运河灌溉抑或是陂塘灌溉,一般都存在着因某条渠道、河流、某一湖泊或陂塘形成的灌溉区域。传统文献上,甚少见有“水利灌区”或“灌区”的表达。一般以渠名、堰名、陂塘名称等来指代整个“灌区”。如《通典》卷2《食货二》“水利田”节云及安徽寿县芍陂一事:“芍陂良田万顷,隄堰久坏,秋夏常苦旱。”^①是则以“芍陂”来指称仰赖其灌溉的万顷良田。亦有以所灌田亩数和里数来泛称一“水利灌区”大小者,如《史记》卷29《河渠书》云:“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②《汉书》卷29《沟洫志》云:“后十六岁,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③

然而,这些“水利灌区”并非自始如此,亦非一贯不变。换言之,史籍描述的“溉田万顷”、“袤二百里”的“水利灌区”状态,可能经历长时间的形成过程,决非起于一时。且随着“灌区”自然、人文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变迁,“水利灌区”或盈或缩,或若干“灌区”相互联合,或一“灌区”分为若干“灌区”,乃为常理之事。《通典》卷2《食货二》“水利田”节云:“(汉)元帝建昭中,邵信臣为南阳太守,于穰县理南六十里造钳卢陂,累石为隄,傍开六石门以节水势。泽中有钳卢王池,因以为名。用广溉灌,岁岁增多,至三万顷,人得其利。”^④钳卢陂灌区“岁岁增多,至三万顷”,显然在不断扩展。又《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2《水利上》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四月条云:

皇甫选、何亮等言:奉诏往诸州兴水利。臣等先至郑渠,相视旧迹。按《史记》,郑渠元引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田四万顷,收皆亩一钟;白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顷。两处共四万四千五百顷。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顷,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询其所由,皆云因近代职守之人改修渠堰,圯坏旧坊,走失其水,故灌溉之功绝不及古渠。况此水二郡六县资其利以溉田亩,望令增筑堰埭。^⑤

可见,至宋时,郑渠和白渠的“灌区”范围锐减,不断萎缩。

细绎“水利灌区”的形成与演变,可发现它主要包括三个阶段或步骤:基础设施(堰坝干渠)形成期。支渠体系的形成扩张期,或合并相邻小型灌区期。调整、整合灌区渠道体系期。在一些灌区,则可能包括第四个阶段,即灌区衰落或萎缩期。

二、通济堰渠渠系穴体系的形成

关于通济堰的文献记载,初见于北宋后期关景晖撰《丽水县通济堰詹南二司马庙记》,其文称:

①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1册,第38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63年,第4册,第1414页。

③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4年,第6册,第1685页。

④ [唐]杜佑《通典》,第1册,第35页。

⑤ 《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第5册,第4906-4907页。

去县而西五十里有堰曰通济,障松阳、遂昌两溪之水,引入圳渠,分为四十八派,析流畎浍,注溉民田二千顷。又以余水渚而为湖,以备溪水之不至,自是岁虽凶而田常丰。

通济堰址位于丽水市西南 25 千米的瓯江与松荫溪汇合口附近的堰头村,^①横截松荫溪。故谓“障松阳、遂昌两溪之水”,不甚确当。其称“分为四十八派,析流畎浍,注溉民田二千顷”则业已形诸“水利灌区”。“灌区”东、北濒大溪(即瓯江上游),西抵大山。渠系从西南角向东北端伸延,覆盖整个碧湖盆地(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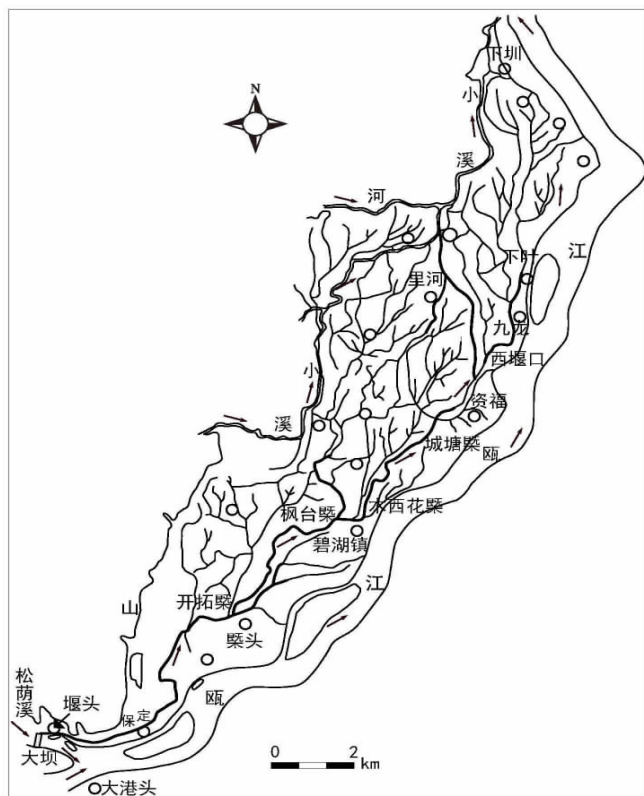


图 1 当代通济堰灌区示意图

(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浙江分册》上(文物出版社 2009 年)第 373 页改绘)

涨,陂渚派析,使无壅塞。泉坑之流,虽或湍激,堰吐于下。工役疏决之劳,自是不繁,堰之利方全而且久。……今五十年民无工役之忧,减堰工,岁凡万余,公之功可谓成其终者也。公之石函防始以木,雨积则腐,水深则荡。进士刘嘉补之以石,而镕铁固之。^③

石函乃通济堰主干渠的关键设施,既解决沙石淤塞渠道之患,亦能确保渠水畅通下行。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知县樊良枢《议复水利文牒及府道批示》云:“前人患山水与渠水争道,沙石堆壅,则渠水为胜。故设为石函,使渠水从下,山水从上,石不壅遏,水不争道,法甚善也。”^④故范成大《丽水县修通济堰规》第十一条“石函斗门”曰:“石函或遇沙石淤塞,许破堰工开淘斗门。遇洪水及暴雨,实时挑闸,免

北宋以来,通济堰“灌区”兴修不断。仁宗明道年间(1023-1024),丽水知县叶温叟,“悉力修堰”,^②这是现今可知最早重修通济堰的举措。元祐七年(1092),知州关景晖、县尉姚希治之。政和初年,丽邑知县王提、助教叶秉心建石函,修斗门,后邑人进士刘嘉补葺之。乾道四年(1168)叶份撰《丽水县通济堰石函记》记其事云:

处之为郡,僻在浙东一隅,六邑皆山也。惟丽水列乡十,而邑之西地平如掌,绵袤四乡。松、遂二水合流其上,直下大溪,通于沧海。土壤而坟为田数千顷,雨不时则苗稿矣。在梁有詹南二司马者始为堰,民利之。然泉坑之水横贯其中,湍沙怒石,其积如阜,渠噎不通,岁率一再开导,执畚鍤者动万数。堰之利,人或不知,而反以工役为惮也。我宋政和初,维杨王公禔宰是邑,念民利堰而病坑,欲去其害。助教叶秉心因献石函之议,膺公契心。……函告成,又修斗门以走暴

① 钱金明《通济堰》,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年,第 1 页。

② 《丽水县通济堰詹南二司马庙记》。

③ [清]王庭芝:同治《通济堰志》,第 1 册。

④ 详见[清]王庭芝:同治《通济堰志》。

致沙石入渠。才晴,水落即开闸,放水入堰渠。轮差堰匠,以时启闭。”^①足见其重要性。关于堰槩,《堰规》第七条“堰槩”曰:

自开拓槩至城塘槩,并系大槩,各有阔狭丈尺。开拓槩中枝,阔二丈八尺八寸,南枝阔一丈一尺,北枝阔一丈二尺八寸。凤台两槩,南枝阔一丈七尺五寸,北枝阔一丈七尺二寸。石刺槩,阔一丈八尺。城塘槩,阔一丈八尺。陈章塘槩,中枝阔一丈七尺七寸半,东枝阔一丈八寸二分,西枝阔八尺五寸半。……其余小槩头与湖塘堰头……。

“槩”同“概”,平也,^②即平水木。用以启闭放水,成为一种提水设施,有如沟渠之类。^③是故开拓槩中枝、南枝、北枝,凤台槩北枝、南枝,城塘槩,石刺槩,陈章塘槩中枝、东枝、西枝等大小槩,在乾道四年(1168)之前既已存在。又叶穴,《堰规》第十七条“叶穴头”云:“叶穴系是一堰要害去处,切虑启闭失时,逐致冲损。兼捕鱼人向后作弊。今于比近上田户,专差一名充穴头,仰用心看管。如遇大雨,实时放开闸板,或当灌溉时,不得擅开。”上引樊良枢《议复水利文牒及府道批示》云:“叶穴与大溪相通,有闸启闭,防积潦也。”清同治六年(1867)《郡守清公重修通济堰志》说道:“函成,又为叶穴,以泄溪流。”^④光绪三十二年(1906)《兴修通济堰事务文书》亦云:“叶穴即淘沙门。”^⑤故而叶穴不仅用以调节干渠进水量,而且亦有排沙清淤之功。堰坝,本为木结构,南宋开禧中,郡人何澹筑以石堤,加固大坝。^⑥又上引“湖塘堰”,当即指散布于“灌区”内的大小湖、塘、堰,诸如横塘湖、白湖、李湖、米湖、张塘、陈家堰、黄陂之类,“务在潴蓄水利”,“以备溪水之不至”。综上可知,在宋代,通济堰进入不断完善的过程——建石函,设叶穴、槩,筑石堤,立斗门,潴湖塘。堰坝—干渠—石函—叶穴—斗门—槩—湖塘堰灌溉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后世灌区兴修和运转的基础。

三、“三源四十八派”考

南宋绍兴八年(1138),丽水县丞赵学老将元祐七年(1092)县尉姚希所定的“堰规”悉刻于石,并“图其堰之形状”。赵学老述其事云:

通济堰,横据松阳、大溪,溉田二千顷,岁赖以稔。无复凶年,利之广博,不可穷极。询其从来,乃梁詹南二司马所规模,逮今几千载。爰自兵戈之后,石刻湮没,昧其事踪。学老来丞是邑,以职所莅,回访于闾里耆旧,得昔年郡守关公所撰□记,略载前事。今董图其堰之形状并记刊之,坚珉立于庙下,仍以姚君县尉所规堰事,悉镂碑阴,庶几来者知前修勤民经远之意,不坠垂无穷矣。绍兴八年七月初一日汶上赵学老书。

碑石现存于丽水通济堰詹南二司马庙内,为明洪武三年(1370)丽水知县王弼、县丞冷成章重立碑。^⑦

① 详见[清]李遇孙:《括苍金石志》卷5《范石湖书通济堰碑》(见《石刻史料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辑第15册,第11343-11348页);[清]王庭芝:《同治通济堰志》;孔凡礼:《范成大佚书辑存》,中华书局,1983年,第174-181页。

② 参阅宗福邦等:《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32页。

③ 熊元斌:《清代江浙地区农田水利的经营与管理》,《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第91页。

④ [清]王庭芝:《同治通济堰志》。

⑤ [清]沈国琛等:《光緒末年通济堰志》,浙江省图书馆孤山分馆古籍部藏宣統元年(1909)刻本,共2卷,残剩卷1。

⑥ 元至正四年(1344)《丽水县重修通济堰记》,见[清]王庭芝:《同治通济堰志》。

⑦ 碑石落款曰:“明洪武三年十一月望日处州府丽水县知县王弼、县丞冷、主簿重立。”道光《丽水县志》卷8《职官志》,第3页,亦可参阅同治《丽水县志》,《中国方志丛书》据同治十三年(1874)影印,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第2册,第464页。

划分依据。又清宣统元年(1909)《重修通济堰志序》有“期别上、中、下三源”一说。^①即以轮灌时间先后分为上、中、下三源。而诸如至正四年(1344)项棣孙^②所撰《丽水县重修通济堰记》“袤百几十丈,名曰通济堰。股引脉,导(入)上、中、下三源,灌田二十万亩余”^③明万历初年《重修通济堰记》“支分东北,下暨南北,股引可三百余派,……统之为上、中、下三源”^④清康熙十九年(1680)《重修通济堰记》“障松、遂两溪水入大川,……定为上、中、下三源,蓄洩灌溉几二千余顷,民利之久矣”^⑤等碑文,说法含混,皆无交代“三源”究竟以何为分。道光《丽水县志》卷3《山水》“大溪”条“通济渠”下注云:

通济渠水,其源有三。一在县西五十里。自十七都宝定庄引松阳大溪水入渠,历十二、十五、十、十一、九、五凡七都,是为大渠。一在县西四十里,源出白溪。历十三、十二、九、五凡四都,至白口合大渠水,是为白溪渠。一在县西四十里,源出岑溪。自十四都历九都,是为金沟渠。三渠合流至石牛,入大溪。好并隆司先生根据此条史料认为通济渠水涵有三源,即大渠、白溪渠和金沟渠,三者从而构成通济水系^⑥。同治《通济堰志》万历三十五年(1607)樊良枢所撰《丽水县修金沟堰记》云:

余既治通济大堰,诸堰小矣。旁有金沟圳,距大圳(即通济堰,引者注)五里许。沂其源,从松之诸山溢出,踰十八盘泻长坑,注白口,与大溪水会,约可溉田二百余顷。西临上源,东至中源,厥田惟沃土,沟水湍涌则怒而喷为沙石。两源之近者,田不得义,旱则漏而不盛水,浆以待稿也。……祛其害,两源间之沃土穰穰矣,何必减通济哉!

长坑,今有苍坑村,当为同一处地。道光《丽水县志》卷3《山水》“水利”节“金沟渠”条谓:

通济渠既纳松阳溪水,别有山水自十八盘达岑溪,因于通济之北筑堰,亦始于詹南二司马,即《汇纪》所谓观阮堰也。明万历中,渠壅不通,水泛滥,坏上、中二原田,知县樊良枢修之。

《汇纪》即明万历《括苍汇纪》。是则观阮堰处岑溪之上,截为渠水,为金沟渠(圳)。仰赖其灌溉的二百余顷田地,处于上、中二源间。即言之,此处田地因位于山前台地,地势相对较高,通济堰渠水无法顺流至此,故其并不倚赖通济堰灌溉。因而樊良枢“西临上源,东至中源”的表达,其意在说金沟渠既不属于上源,亦非归于中源。又同卷“白溪渠”条云:

源出高畲山,至白河庄凿渠受之,即《汇纪》所谓司马堰也。其下有沙堰、朱堰、上陂、黄陂、张堰、陈家堰诸目,通济渠东北诸田咸资于此。

白溪,当即今之高溪。其下有白河庄,即今白河村。诸如司马堰、沙堰、朱堰之类,皆横截溪上,釀为白溪渠,灌溉西乡十三、十二、九、五都之田。虽说“通济渠东北诸田咸资于此”,实则是倚赖白溪渠水灌溉。质言之,在方志编撰者看来,虽然四都之田不倚赖通济大渠灌溉,但依旧属于通济堰“灌区”。是则,通济渠由通济堰大渠、金沟渠、白溪渠构成,上引《县志》和好并氏的分析,皆已述及。然《县志》“通济渠水,其源有三”意为通济渠“灌区”的灌溉水源分别来自松荫溪、岑溪和白溪,并非我们追问的“三源”。同治《通济堰志》万历三十五年(1607)《上中下三源轮放水期条规》曰:

① 详见[清]沈国琛《光绪通济堰志》。

② 按,项棣孙,字子华,以荐为青田教谕。至顺元年(1330),登进士,授同知奉化州事,调福州路总管府推官等等。详见万历《括苍汇纪》卷12《往哲纪》,第638页下。道光《丽水县志》卷10《人物志·元》,第21页。

③ [清]王庭芝辑《同治通济堰志》。

④ 万历《括苍汇纪》卷7,第551页;雍正《处州府志》卷18《艺文志》,第7册,第2382页;[清]王庭芝辑《同治通济堰志》。

⑤ 雍正《处州府志》卷18《艺文志》,第2393-2394页;王庭芝《同治通济堰志》。

⑥ 参阅好并隆司《中国水利史研究论考》,冈山大学文学部,1993年,第2章第2节《通济堰水利机构の検討——宋代以降の国家権力と村落》,第82页。

开拓槩分南、北、中三支,凡初一至初三等日,中支水道尽闭,水分南、北二支,畅流灌溉上源十七都之宝定、义埠、周巷、下梁、槩头、杨店、新溪、汤村、前林、岩头、金村、魏村,十五都之三峰、采桑、下汤、吴村、河口、上保、中保、前炉等二十庄田禾十余里,三昼夜而足。至初四日闭南、北二支,开中支水。凤台槩北支分陈章塘槩,南支分石刺塘槩,至城塘槩闭之。灌溉中源十五都之下保、霞冈,十二都之河东、周村、下槩头、白河、章塘、大陈,十一都之横塘、赵村、上各、下河、新坑、巷□,十都之资福、上黄、上地等十七庄田禾十余里,三昼夜而足。至初七日,上、中二源旁支皆闭,开城塘等槩,使渠水尽归下源,灌溉九都之纪保、中叶、周保、刘保、下叶、泉庄、唐里、季村、章庄、蒲塘,七都之新亭,五都之赵村、石牛、任村、白口,十都之里河等十六庄田禾十余里,四昼夜而足。三源因而复始。

显见,三源有着明确的地域范围,不同的村落归属于不同的“水利地块”。兹据上引《轮放水期条规》,将各都、村落列表如下:

表 1 明万历时期三源范围简表

源	乡 都	村 庄
上源	义靖乡十五都	三峰、采桑、下汤、吴村、河口、上保、中保、前炉
	元和乡十七都	宝定、义埠、周巷、下梁、槩头、杨店、新溪、汤村、前林、岩头、金村、魏村
中源	来仪乡十都	资福、上地、上黄
	义靖乡十一都	横塘、赵村、上各、下河、新坑、巷□
	义靖乡十二都	河东、周村、下槩头、白河、章塘、大陈
	义靖乡十五都	下保、霞冈
下源	孝行乡五都	赵村、石牛、任村、白口
	来仪乡七都	新亭
	来仪乡九都	纪保、中叶、周保、刘保、下叶、泉庄、唐里、季村、章庄、蒲塘
	来仪乡十都	里河

资料来源: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上中下三源轮放水期条规》,见同治《通济堰志》。万历《栝苍汇纪》卷2《沿制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193册,页465)。

由《轮放条规》和表1可知,开拓槩南、北二支灌溉上源十五都、十七都两都二十庄之田。开拓槩中支,凤台南、北二支,陈章塘槩,石刺塘槩等大小槩灌溉中源十、十一、十二、十五等四都之田。城塘槩、九思槩等大小槩灌溉下源五、七、九、十等四都之田。换言之,倚赖开拓槩南、北支灌溉的村庄田地即为上源,倚赖开拓槩中支、凤台槩等灌溉的村庄田地为中源,倚赖城塘槩、九思槩等灌溉的村庄田地为下源。质言之,上中下三源不仅以灌溉轮放先后时间而分,而且又以“田户”多寡为据而分。关键是在此处的“三源”仅指倚靠通济堰大渠灌溉的地块,而不包括金沟渠和白溪渠所溉之田。

(二)明清时期三源范围的盈缩

南宋时期,三源开始形成和确立,其后,三源开始村落化,即以所在地的村落为节点开始划分界限。明中期以降,三源不断的在调整范围。由表1和表2可知,至清乾隆时期,将原属中源的下保和霞冈二村划归于上源,原属下源的里河划归于中源。原来上源的前林、前炉已被箬溪口和吴村取代。中源新增加峯山、朱村、后店和张河四村,而原来的新坑和巷二村则未见记载。将六都的黄山、土地窑、白桥、郎奇四村和九都的纪店、五都的下堰纳入下源,而原有的新亭村则又未予列入。这其中并不排除文献记载缺失和讹谬的情况发生,然其最关键的转变是将碧湖盆地山麓附近的村落纳入三源范围之中。

表 2

清乾隆时期三源范围简表

所属何源	所属乡都	村庄	合计	道光《丽水县志》各都村庄数
上源	元和乡十七都	魏村、金村、岩头、义埠街、周项(即周巷)、新溪、下梁(即下樑)、箬溪口、槩头、汤村、杨店、宝定	12	13
	义靖乡十五都	采桑、下汤、山峰(即三峰)、碧湖(上中下三保)、霞冈	5	6
	义靖乡十六都	吴村	1	9
中源	孝行乡六都	峰山	1	9
	来仪乡九都	朱村	1	9
	来仪乡十都	上黄、上地、资福、西黄、里河(即李湖)、后店、张河 ^①	6	7
	义靖乡十一都	下河、上阁(即上各)、横塘、赵村	4	6
	义靖乡十二都	大陈、章塘、白河(即白湖)、周村、河东、下槩头	6	6
下源	孝行乡五都	白口、赵村、下堰、石牛、任村	5	5
	孝行乡六都	白桥、郎奇(即郎其)、黄山、土地窑	4	9
	来仪乡九都	塘里、下陈、纪店、章庄、季村、蒲塘、泉庄、九龙(包括纪堡、周堡、叶堡、刘步、下叶)、叶村	9	9

资料来源 道光《丽水县志》卷2《疆域》,同治《通济堰志》,乾隆二十一年(1756)《三源民夫名数》。

由乾隆而至同治一百年左右时间里,三源之间的变化亦是较为明显。由表2和表3可知,将上源的碧湖三保、采桑、霞冈、归并到中源属下。新增的村落有上埠、下埠、吴圩、柳里。而诸如纪店、下堰、后店、张河和六都几个山麓村落又被剔除出三源之外。又据表3和光绪《通济堰志》“三源修堰民夫计数”可知,同治至清末,三源之间并无较大的调整而渐趋稳定。

表 3

清同治时期三源范围简表

所属何源	所属乡都	村庄	合计	同治《丽水县志》各都村庄数
上源	义靖乡十五都	下汤	1	6
	义靖乡十六都	吴村	1	9
	元和乡十七都	魏村、金村、岩头、义埠、周项、新溪、下梁、上槩头、上汤(即为汤村)、杨店、宝定、前林	12	13
中源	来仪乡十都	资福、黄□、上黄、上地	4	7
	义靖乡十一都	下河、横塘、下埠、赵村、上各	5	6
	义靖乡十二都	河东、周村、白河、下槩头、章塘、大陈	6	6
	义靖乡十五都	碧湖(上中下保)、采桑、河口、霞冈、上埠、柳里、新坑	7	6
下源	孝行乡五都	石牛、白口、任村、下赵村	4	5
	来仪乡七都	吴圩、新亭	2	9
	来仪乡九都	蒲塘、里河、九龙(纪保、周保、中叶、下叶、刘埠)、唐里、泉庄、下季村、张庄(即章庄)	7	9

资料来源 同治《丽水县志》卷2《疆域》,同治《通济堰志》同治五年(1866年)《重修通济堰引》,同治九年(1870年)《上中下三源公正姓名》。

① 后店、张河,道光、同治《丽水县志》卷2《疆域》“来仪乡十都”条下无,民国《丽水县志》卷2《疆域》“西来区十都”条下有后店村,而无张河村。今不知其所在,姑且系于十都之下。

综上所述,可以认知,明清以来三源的转变主要有:(1)上源的开拓南支一槩尽归中源,上源范围缩小至以十七都为主的村落。下源曾将盆地西北端山麓处的村落纳入灌溉范围,然仅维系一段时间,而非常态。(2)三源内和交界处的村落,时有增减。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随着各源内部不断的开发带来新村落的成长而加入灌溉用水体系;另一方面可能是原有村落的扩展、联合而带来小村落的衰落和消失。(3)三源虽伸缩繁复,然始终并未将由金沟渠和白溪渠灌溉的高处田地纳入进来。即言之,诸如十四都的沙岸(今沙岸村)、兰山(今岚山头村)、岑口(今岑口村)等高地村落,始终独立于三源之外。这些村落,不仅历次修濬不派民夫,而且往往是私自开展修濬及维系渠道的各项工作。

四、通济堰“灌区”与碧湖盆地的开发进程

万历《括苍汇纪》卷4《次舍纪》“丽水县治”条云:“初县治在今县西三十五里资福村。”^①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94《浙江六·处州府》“丽水故城”条云:“府西三十五里。唐初置丽水县,属括州。武德八年(625)省入括苍县。今其地有古城冈、县头山、旧城塘之名。”^②道光《丽水县志》卷3《山水》“县头山”条云:“在县南三十五里。以古县治在资福,山蔽其前,故名。”^③是则“古县治”当即顾祖禹所说唐初所置之丽水县治。资福在通济堰“灌区”中源,其地在唐初既已置县城,说明早在唐初碧湖盆地的开发进程即已显现出端倪,然并无其他史料佐证。^④宋《元丰九域志》丽水有“九龙”一镇,^⑤九龙亦在碧湖盆地,临近资福,位于下源。明清以来,碧湖盆地的宝定、碧湖、九龙、石牛等地均设铺舍,为交通要道。^⑥清代又在碧湖上保、中保分置县丞署和千总署。^⑦需注意者,上述这些聚落的连线恰为碧湖盆地官路走向。^⑧这条官路沿着大溪由上源宝定通至下源石牛,环绕盆地外缘。盆地外侧临大溪处等地,向为官府所重,处于官府的控制下,开发进程起步较早。然盆地内侧的情况如何?

据前揭可知,通济堰、观坑堰、司马堰,为通济堰“灌区”水源供给的三处核心设施。虽史籍认为此三者皆为詹司马所凿,然观坑堰和司马堰可能早在通济堰建成之前既已存在。首先,两堰皆位于山奥中小溪出谷口,因势利导,稍加修治,即可为农田灌溉之资。相较而言,通济堰横截松荫溪所需要的技术较为成熟,需费较大的人力、物力。其次,碧湖平原外缘临近大溪,地势低洼,易遭山洪之患,而平原内侧靠近山前台地处,地势稍高于平原外缘,较便于人居。换言之,白溪渠和金沟渠两岸当是首先开发,然后由内侧向平原纵深处扩散,而外缘亦渐次向平原中间扩展。

另外,“灌区”内分布着诸多的陂塘、湖堰。这些陂塘、湖堰是“灌区”灌溉水利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南宋至明清,“灌区”内渠系、陂塘的开挖不断。前引万历初年《丽水县重修通济堰记》云:“支分

①《括苍汇纪》,第478-479页。

②[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9册,第4321页。

③道光《丽水县志》卷3《山水》,第21页。

④鲁西奇先生等认为,自六朝以迄至北宋末的近一千年间,与浙赣山地、皖南山区、湘中丘陵等山区相比,浙闽山地处于较为落后的后进阶段。进入南宋以后,就浙南山区而言,缙云县西南的冯公岭已垦辟出大量的梯田,并且有大量的瓯、闽之人移入。详见鲁西奇、董勤:《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4期第39页。是则,诸如处州冯公岭之类的山区既然已经开发梯田,那么碧湖盆地的开发程度也就可想象了。

⑤《元丰九域志》卷5,中华书局点校本,2005年,第217页。

⑥《括苍汇纪》,第480页。

⑦道光《丽水县志》卷2《公署》,第15-16页。

⑧同治《丽水县志》卷1《通济渠图》,第45-46页。

东北,下暨南北,股引可三百余派(即为派,引者注),为七十二槩,统之为上、中、下三源。”从四十八派增至三百余派,从四十槩左右增至七十二槩的过程,是“灌区”开发进程不断深入和人群、聚落渐次增加最鲜明的反映。诸如许塘、潘塘、郑湖、吴湖等以姓氏命名的湖塘当是以村落为单位进行开发。湖塘的使用,可能一村拥有一个塘,可能多村共用一个塘。换言之,一些村落并不始终仰赖通济大渠以资灌溉。在丰水期,这些倚靠雨水补给的湖塘,亦能为水田提供较好的灌溉条件。

五、结语:“灌区”的意义

综合分析,可以认知(1)通济堰“灌区”的形成经历以下过程:其一,从各村落松散破碎的渠道、水沟和零星点缀着的湖塘到“三源、四十八派”的确立。这一阶段大致完成于南宋初期。其二,从“三源、四十八派”到通济堰大渠、白溪渠和金沟渠的联合。这一阶段完成时间,亦不晚于南宋。白溪渠和金沟渠虽与通济大渠连接成整个渠道体系,但这两渠的村落始终游离在“三源”之外。(2)“灌区”的演变以“三源”盈缩为核心而进行的扩展和演变。同时平原中陂塘、湖堰的增加不断地改变着“灌区”的状态和面貌。(3)南宋以来,通济堰“灌区”可能经历了由“田户”为基础的三源到以“村庄”为基础的三源的转变。这一倾向在明清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上对通济堰“灌区”的形成及其演变的梳理,表明“水利灌区”并非自始如此,亦非一成不变。浙南通济堰“灌区”的这一状况,亦于其它诸多的“水利灌区”相耦合。如陕西汉中城固县的五门堰,“五代至北宋前期,主要灌溉堰首龙门以下、斗山以北田地,约三千亩左右。至南宋初,先于斗峰下创置木槽,接引渠水下流,灌溉斗峰以下田亩;南宋后期至蒙元前期,复在斗山下开凿过水渠道,引水通过斗山之麓,下流灌田,整个灌区灌溉田亩已达四万余亩;到元后期,又凿穿斗山下的石嘴,最终疏通过斗山之麓向下流淌的渠道,使斗山下灌区稳定下来,五门堰灌溉系统遂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明中后期,经过弘治、万历年间的几次大规模整修,奠定了堰坝、石峡灌渠的格局,形成所谓“三十六洞湃”的灌渠系统,灌溉田亩最多时可达五万亩;清前中期,灌渠系统略有调整,最后形成“九洞八湃一渠”的格局,灌溉田亩维持在四万亩上下;清后期,灌区有所缩小,灌溉田亩或不足四万亩。”^①其“灌区”的演变过程清晰可见。又山西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的东庄营与东庄村,一向均使中河水灌溉田亩,后因东庄营失去灌溉水源而与东庄村发生纠纷。在知县和渠长的努力下,将这两村联合成一“灌区”,并制定相应的用水规章。其《中河水利碑记》略云:

……,经本县亲勘得东庄营与东庄(村)均使中河之水,任水自流,并未定有水程。乾隆十二、十三年间,汾河水涨,将东庄营河口淤塞,该村尚有小站营之退水灌地,是以二十余年来相安无事。近因小站营之退水已开渠置入汾河,东庄营不能分沾余润,而中河及泉子河之水久为东庄村独占其利,致控到案。查东庄营既向与东庄村同使中河之水,自应分定水程,轮流灌溉,免致争端。随飭令总渠长等妥议。去后嗣据总渠长张清馥等议,于泉子河口设闸,东庄营入例地十四顷六十余亩。又柳堰河两岸地内有东庄村地三顷九十余亩,与东庄营同程使水,应分水六日六夜。东庄村入例地九顷六十七亩,应分水四日四夜。复经本县亲诸勘明形势,飭令择期抬闸,照议分程使水,取具两造遵依在案。……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立。^②

[下转第 81 页]

① 详请参阅鲁西奇、林昌文:《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会变迁》,第 42 页。

② 详见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一》,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第 219-220 页。

合等等,凸显社会事务中的政府角色与作用问题”。^①换言之,在研究清代社仓时,不能忽略清代积贮方略的考量与相关制度、政策的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动态地理解社仓制度及其嬗变,并以此为视角,反思传统社会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和作用。

以往对清代社仓的研究倾向于宏观考察,但对社仓与基层社会的管理抑或是控制,社仓与宗族、士绅的关系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考论。

综括全文,近百年来社仓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可谓琳琅满目,蔚然壮观。但并非无可挑剔,亦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展望未来,可以断言社仓研究大有可为。

[参 考 文 献]

- [1]张全明.社仓制与青苗法比较刍议[J].史学月刊,1994(1).
- [2]吴定安.朱子社仓之法及其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2000(12).
- [3]段自成.明中后期社仓探析[J].中国史研究,1998(2).
- [4]穆峯臣.试论乾隆朝社仓的管理与运行制度[J].满族研究,2008(4).
- [5]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6]张大鹏.朱子社仓法的基本内容及其社会保障功能[J].中国农史,1990(3).
- [7]倪根金.明代广东社仓义仓考[J].广东史志,2002(2).
- [8]陈春声.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J].学术研究,1990(1).
- [9]白丽萍.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建设[J].武汉大学学报,2006(1).

~~~~~  
[上接第102页]

由此,我们看到相异于通济堰和五门堰的一个小“灌区”的形成及其用水规章确立的鲜活过程。然则水利“灌区”的意义何在?

首先,“灌区”不仅是一地人群的基本生存区,也是基本生活区。同时“灌区”往往和村落相重迭,故对“灌区”的剖析离不开对村落及其村落共同体的研究。其次,“灌区”大者涵有数万亩之田地,可跨数县,小者如东庄村和东营村,仅一两村的范围而已。很难想像大“灌区”是如何地紧密不可分。因而,“灌区”的共同体特征应是基于一定的地域范围而言。即多大的“灌区”能恰到好处地支持“水利共同体”的成立,值得玩味。

[本文在写作及修改过程中,承蒙鲁西奇教授悉心指教。历史系张霞同学告知有关山西的水利史料,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 [参 考 文 献]

- [1]熊元斌.清代江浙地区农田水利的经营与管理[J].中国农史,1993(1).
- [2]张芳.中国古代淮河、汉水流域的陂渠串联工程技术[J].中国农史,2000(1).
- [3]钱金明.通济堰[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sup>①</sup> 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